

菡子文集（三）

菡子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书 名： 菡子文集（三）

作 者： 菡子 主编

出 版 社：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4

ISBN ： 7-5399-1884-5/ I217.62

定 价： 120.00

目 录

1	无言的访问
5	拜见老师记
9	关于生老病死
12	“左派幼稚病”
14	致江幼农
19	梨 味
25	豪 雨
29	志在千里
31	座右之铭
34	国宝之外
37	排排坐
40	暖 冬
43	靳以的女儿
47	景云与我
51	老 龚
53	韧 子

55	阮波的乡居
58	我的男同学
62	神 交
64	影 家
68	激流中的友谊
70	重逢日记
87	致 LM
89	独立小屋
92	乡村的童年
161	出生地
163	苦 夏
166	七个铜板
167	我的少女时代
175	小小的长征
182	野孩子、女兵及其他
188	夜 行
196	握笔史话
206	救我于垂危之中
208	两套军棉服
210	我的拐杖
212	双足的命运
214	鞋 子
218	我的消费
220	盲厨师的故事
223	金蔷薇啊,金蔷薇
225	母校和植园
227	投入书中的世界

229	清 风
234	心 曲
237	驼铃吟唱
241	文学之路
256	我为什么写作
258	我的自勉
260	赞一两千字的散文
263	作者的注释
267	和作者的对话
273	我与《收获》
275	农场与创作
288	诗意和风格
290	陈毅《三十五岁生日寄怀》诗注
294	由小见大
296	祝你安居山村
299	小试轻装上阵
301	关于《明天的早晨》的书简
303	他的预见和忧患
305	英雄人物是革命战争文学的灵魂
309	书,我的良师益友
312	小书——《纠纷》
314	真挚的颂歌
318	生活赋予的使命
320	生花的笔
322	如诗如画
324	山水之情
327	八山十七水

- 330 我读《铁马冰河》
334 我与《万妞》
337 童年风俗画
340 关于《重逢日记》的说明
341 美的摄取
343 介绍《火烧林》
345 恳 求
347 喜读《冰花集》
349 致我的小朋友们
352 《前线的颂歌》后记
354 江南新话
356 《乡村集》跋二
358 《记忆之珠》序跋
360 《初晴集》后记
362 《前方》跋
363 《魂归江南》编后絮语
365 《幼稚集》编后记
366 在朝鲜,我也要做一个诗人!
368 《万妞》后记
369 《重逢日记》跋
371 常常注重主旋律
374 《人生不是梦》序
376 《栗阳》序
378 《童年小记》序
379 《女兵列传》(第一集)编后记
383 《女兵列传》(第二集)编后记
385 《女兵列传》(第三集)编后记

388	路发今	出书
390		与雷加的通信
404		与于耕的通信
408		与彭龄、章谊的通信
430		与张舸、张建明的通信
436		与王吉亭、许愨的通信
462		与田森的通信
471		与王德洋的通信
484		与程桂芬的通信
506		与朝晖的通信
518		与文友的通信
527		与挚友的通信
		[附录一]
531	张留芳	菡子著作年表
		[附录二]
549	杜 宣	女兵去矣
553	何 为	菡子回归大自然
555	袁 鹰	菡菖香消,无悔有憾
559	丁 宁	万千心事难寄
565	束沛德	难忘菡子
570	张继仙	悼菡子
572	路发今	为菡子送行
575	修晓林	菡子阿姨
578	张留芳	《菡子文集》编后

无言的访问

——记巴金

《文学报》准备发表一批老作家的访问记，我欣然同意写巴金同志。虽然我常在乡下，两三年来对他只有几次短暂的访问，但自他发表《一封信》以来，我作为他的忠实的读者，听到过他的倾诉；他最近赠我在四川出的几本书，更向我叙述了那属于他的遥远的年代。近三十年来，我们两次同赴战地；十年内乱中，也有不少难忘的回忆，那么，即使我对他的访问几乎是无言的，但我通过事实和对他的了解，也可以写出对他的敬意。

《春天里的秋天》是我读到的第一本他的小说，它是闯进我少年时代的第一个恋爱故事，以后也陆续看到他那时发表的中篇小说。我所生活的女子师范学校，正被封建统治和它思想的影响窒息着，于是巴金引用丹东的话：大胆，大胆，永远大胆！在我们的本上，留下粗壮的字迹，确实起过解放思想的作用。他还引用哲人的话：一粒麦子活着，是一粒麦子；一粒麦子死了，会长出许多的麦子来！对生物的价值，给以富于想像的活力。这些都是他的小说给我充满信念的启示。至于觉慧的出走，更指出我们要选择的道路。在革命队伍中就有不少是仿效觉慧的。虽然巴金未能指明走向哪里，他自己也大都是孤军奋斗，但仍不失为一个先驱者。

解放以前，我曾听说巴金是只能用笔说话的人，果然，在解放后的第一次文代会上，他在发言时悄悄离去，却给我们留下了一封

热情洋溢的信。我有时远远地看着他，他那谦虚朴讷的表情，给我的印象很深，我甚至认为伟大的作家就该是这个样子。

但是，他在朝鲜却出现了奇迹。靠近志愿军政治部的时候，我们想到志愿军会欢迎我们这批祖国来的创作人员，会期待着作为我们组长的巴金同志的答辞，这是别人不能代替的。巴金同志意识到这一点，他不动声色，没有一句推诿的话。彭总会见我们以后，在矿下的志愿军政治部礼堂里，正放两部电影。他借着放映机旁的弱光，修改补充自己的发言稿，嘴里还念念有词。后来在正式的欢迎会上，他从容地站起来，并且不用发言稿，对着人群做了亲人般的谈话。开始，我看他手里没有发言稿，心里很慌。随着他的吐字和人们的表情，我释然了。掌声中，我感到巴金同志第一次作为集体代表的成功，是他在陌生的战士面前怀着真挚的爱的表白。这是他公开讲话的第一次，虽然很像小学生背书，但看到这位近半百的人那么认真地背着，谁能不感动呢？！这之后，我还听到他不少即席发言，都是很得体的，有时不免带着滞重的讷讷之声，但它却蕴藏着不尽的深情。他平时近乎羞涩的沉默，他像白雪一样的朴素，都使我深深地产生了崇敬之情。

巴金两次赴朝，比我们谁都呆得长。上甘岭战斗前夕，我走过他们所在的中线防地，那是东线与西线高山之间的一段丘陵地带，驻防工事的石质松软和比较开阔的地形，都使我担心他的安全。我频频回首，想着他是我们中的年长者却慨然允诺到朝鲜前线；他在大家执笔之前第一个写出《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他在战斗中孕育了《团圆》（即电影《英雄儿女》）里的王成兄妹的英雄形象。他在这里，就是朝鲜战地全体指战员的一个胜利。

巴金的生活简朴得使我惊异。他平时布衣布鞋，从不挑剔菜饭。上战地时，途中不问遇到什么险阻，他从未抱怨，也不讲一句多余的话。他不能胜任艰难的步行，但他从没有什么失误。和他在一起行军，时时感到踏实、安全、庄严。他的勤奋更使我愧疚莫

名,不问在什么情况下,他总是在不断地写,不断地学习外语。赴朝之前,他住在我的隔壁,我不时听到他在读俄文的单字。无论在另一方面,我觉得他都是可敬可亲的。

过去我曾把俄国的赫尔岑和契诃夫看作是与巴金有联系的作家,巴金译赫尔岑的《家庭的戏剧》,我很喜欢,一直带在身边。六十年代碰到巴金,他又送了我一册,我更为珍视。私心认为巴金的气质(坚定的信念)和优美的文笔(把感情化成文字),与赫尔岑有相似的地方,在《往事与随想》的译后记中,巴金心中的赫尔岑,正是他的老师。契诃夫一生与庸俗作斗争,连他的容颜“也愈来愈变得严肃、深沉和优雅”。巴金的纯朴真挚,也可与契诃夫相比。在绝望的七十年代初期,我逐渐觉得世界上不容“友谊”、“真诚”存在,当我怀念谁或回忆往事时,就有一双脚(感觉上是铁蹄)在我的头上踏过,仿佛要踢开我过去的一切。有时偶尔打开封存的赫尔岑和契诃夫的作品,我像怕火一样地看着它们,就是这些书使我这样痛苦而矛盾,不得安宁,因之也曾迁怨于巴金:你书中的“心”呀,“爱”呀,岂不也诓骗了我?但是一个人没有信念,人们之间没有友谊和关怀是活不下去的,这样活着比死更难。这是我在十年内乱中感到最痛苦的事。

不过在我内心深处,也自有巴金独特的风貌存在着:他从不迟到早退,认认真真地做他力所能及的劳作,每看到他拣菜除草,我把他看成一个自食其力的老农;他没有参与对任何人的揭发批判,从而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和正直;他没有丧失信念,默默地承担苦难,每顿却努力咽下一定数量裹着白糖或辣酱的馒头。在“牛棚”里他还在学日语。有一次我还发现他星期六就写好了星期天的“思想汇报”,这种“超前”行为,天地可鉴,是值得效仿的。

“文革”以后的巴金,带着创伤和悲痛,迅速站起来了。证明他“比有些人更爱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国家”。除了真挚纯朴而外,他敏锐而清醒,高瞻远瞩,虚怀若谷。责任和真诚使他

不停地挥笔,畅所欲言,以总结历史,干预生活,解剖自己,他的独特的文学创作,已经和将要增添社会的精神财富,同时也是历史的一面镜子。

“是作家,就该用作品同读者见面。”过去和现在,他都忠于自己的职责。解放前的二十年,从他一九二九年发表的第一本小说《灭亡》算起,每年当有二十万字与读者见面。解放后的作品,我也粗匡一下,已发表的也在八十万字以上,这样的数字,也把他的晚辈如我者,远远地抛在他的后面。

一年多以前,他为自己订了到一九八四年(八十岁)的五年计划:两部长篇小说,一部《创作回忆录》,五本《随想录》,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在这些数字面前,人们可以有丰富的想像,我只牢牢记着,他一年得写三四十万字,四川出的他的两本近作,已有二十五万字,翻译和未发表的还未包括在内。一九八一年他又写了多少呵!

明知他闭门谢客,每次回到上海,我在他的门前徘徊,终于揷了门铃。我只不过想见他一面,如果正是他稍事休息的时候,我就上楼坐一会儿,瞧瞧挂在他面前的肖珊的照片,也在他曾写过的那面大镜子面前照照自己,到他的写字台前看看他正在复写的创作或译文。像过去一样,我们只有几句近于普通的寒暄,但我现在望着他,却跟过去不能一样,我默默地向他发自内心的倾诉。其实何必倾诉,他和他的镜子已照出了我。想着他第一个提出“创作要上去,作家要下去”的话,我总是迅速地离开,带着激励和鞭策,不能忘记那些被糟蹋了作家称号的日子,赶快下去,努力写吧!

1981年2月写于故乡

拜见老师记

孙起孟先生是苏女师的训育主任，我们终身的导师。我在一篇《信仰和崇拜连接在一起》中写道：那时集中崇拜的还是我们共同的老师孙起孟先生。无论我这样初一的小同学，还是已毕业离校的妇女运动家罗琼、胡耐秋，对老师的崇拜都是虔诚的。陕北广播电台最早的工作人员孟启予，顾名思义，她是以与老师有关的名字投奔革命的，此时全国各地正成长着一批孟启予们。老师当然已是全国闻名的人物了。现在是民建的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解放近半个世纪以来，去拜见老师就有回到儿童时期的雀跃，真像过年一样。一九四九年初，我到北京开妇代会，大约从女师老同学吴全衡那儿知悉：老师也到了北京，在周总理身边筹备第一次全国政协的召开。我也不问老师是否认识我这个十四年前小小的学生，就跑到六国饭店去找他。老师见我并不陌生，他已知道我在解放区写过《纠纷》，从学校出来就当兵，很喜欢似的。他马上摇通了老同学吴文藻的电话，她是我们女师领导学潮的，现在已是北京公安分局的负责人。老师对着话筒说，现在有个小妹妹跟你讲话。老师多疼爱我们啊！我含着眼泪向学姐汇报了我的情况。后来吴文藻还用摩托车载我到她家玩过。

我们知道老师是真正的忙人，不敢打扰老师。倒是老师想见见我们。一九五七年趁吴全衡赴民主德国常驻国际妇联，我们同

学二十多人在罗琼家聚会,见到了老师。他的学生大都是妇女界、文化界的名人,三五十岁了,在老师面前,还是幼稚可爱的小学生。老师眯眯笑着,我们相互告知在什么地方工作,住在什么地方。老师那时是中央人事部的负责人,好像我们个个都在他的心中。师生之间有那么融和的满足。

一别又是许多年,其中有个“文化大革命”,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到了八十年代,为编《女兵列传》,有一年我住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过春节。住在晨光街的女师好友殷国秀,邀了罗琼、吴文藻约我去南沙沟看老师。年初二,我兴奋得早饭没吃等在门口,到了老师家里,我还不觉得饿,只是有点傻样。老师问我吃了没有?我随口答道,没有。同学朝我眉目示意,我想招待所九时开饭,我说没吃是对的。于是大家吃了师母煮的酒酿丸子,老师还夸我说了实话。

带了老师的鼓励,我从从容容地进入晚年,笔耕不辍。不去北京了,老师留在深深的怀念之中。老师职务多了,我常常从荧屏上寻觅老师,打开电视机,我心灵上有感应,总可找到坐在主席台上的老师。眼睁睁地看他哪怕十分之一秒,不知老师有感应否?虽不能拜见,却给老师写过一封信:

敬爱的老师:您好!

您十月二十三日写的信收到了,还有附来的珍贵史料。老师,我真不敢打扰您呵。九月拿到《记忆之珠》,给国秀和文藻姐各寄一册时,也曾想向您献上一册,作为我向老师的汇报。这本书自始至终都是“孟启予”的报告,不问是生活方面,还是文笔方面。至今我还和在学校里一样,是老师最幼小的学生。从走上生活之路,老师的精神就牵引着我。因为书上印错许多字,油墨又重,我怕伤老师的眼睛,想了许久没有寄。这次就奉上作个纪念吧。《玉树临风》是刘帆编的,我至今只

有一本,他有,就擅自送您了,这本书也有《记忆之珠》的毛病,您随便翻吧,两本书留在您身边,您不看我也会高兴的,您太忙,不必写信给我。

出书真难,我也不想向您饶舌,但我并未灰心。写出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是我的责任。

正如我在校幼小的地位,除听课以外,解放以后见过老师几次,都在兴奋之中,未能很好领受老师的教导。自诩跟老师学的,其实功课很差,敬希谅解。每从荧屏上看见老师,我都仔细辨识;在报章杂志上读到您的或关于您的文章,我也如获至宝。不过心中最记得您说的“始终是干事”这句话,事必躬亲,怕您太累。恭祝

老师健康长寿!

今年是多事之秋,也是我颇为振作的一年。想想自己已是七十多岁,老师肯定八十多了。打开电视机想见着老师,又怕老师还在当着“干事”。大约四月起没见老师出来,我渐渐不放心,莫不是老师病了?不敢想下去。

听说我十二月要到北京开会,女师的同学国秀和文藻驰函告知家中电话号码,约了不见不散。到京第一天就商量去见老师的事。老师果真病了,住在北京医院。吃不多,坐不住,神情恍惚,查查什么病都没有,就是累的!这个病情好像在我的意料之中,可我的心还是酸酸的。国秀写信给师母渴求一见,说学生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了,菡子也是难得来北京,平时老师忙我们不敢打扰,现在请允许拜见吧!我们保证不累着老师。

十二月十九日老师看见我们的信,师母本来心肠就软,得到医生的许可,二十日就回家静养,约我们二十一日去。太高兴了,我们终于有了拜见老师的节日。除国秀、文藻而外,还约了真正的孟启予。

二十一日那天,天上洒下淡淡的阳光。我们都赶在九时以前到达南沙沟的传达室。国秀她们比我早到,怕一起起地去,于老师不便。秘书已候在门口,他轻轻对我说,这几年老师已三次提到好久没有看见菡子了,见我有些激动,就要我先进去,她们回头去接启予。我进去先拜见了师母。

老师坐在一张高椅上,笑容满面,穿着周正,还在办公的样子。可又看出老师脸色苍白,也消瘦多了。想到老师挥之不去的累,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文藻她们三人进来了,我还呆呆捧着要送给老师《二十世纪的女兵》的画册。老师有兴趣只要翻翻珍贵的照片就是了。我们一齐捧到老师面前。我说了原要写在画册前面的话:这里面有您同辈的老红军,还有您学生一辈的女兵。老师顺着我们翻开的页面看,眼中闪闪发光。同时好奇地问我:“有你的么?”我先翻到罗琼的,随后在志愿军的后面,指着在机枪阵地里的我。我们同学不是八路军就是新四军,都该有的。老师笑了,每次他都要问:你们几个谁最小?文藻说她刚过八十岁的生日,另外两个也是七十七八了,老师把怜爱的眼光停留在我身上,我就是最小,也是七十五岁了哟。有些感伤,转面一想,这么大的年纪还能围绕在老师的膝下,长辈和小辈都有福气。正高兴呢,文藻说我们保证了,该向老师告别了。真是依依难舍啊!

出了大门,我们默默地走在林阴道上。国秀又对我说:老师说了三次好久没有见着菡子了,老师对我们的怀念恐怕超过我们对他的怀念。我真想回去陪他再坐会儿,一句话不说。我们之中,启予对老师的感情最深,今天她不一句话没说么?

1996年12月25日

关于生老病死

战争年代的生死观,莫过于“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吧。在朝鲜,大家高高兴兴地活着,死么,达到毫无遗憾的境界。一九六五年去越南,更是抱着“死得其所”的决心。在火热的前线,贪生怕死原是最大的羞耻;只有人为的饥饿,死是被逼的,看着人们死去,心有难堪的悲痛。对待暴风骤雨的清理队伍,求生和求死都很困难,不过有信念撑着,最后终于雨过天晴。对于不幸屈死的同志,我尊为烈士,却觉得我们对他抱有终身的遗憾。回首往事,我常常感谢组织,凡我的错误,从未轻轻放过;要是弄错了的,不问过了多少时候一定会给我一个公正的结论,有时还慰勉有加。

参加工作六十年,虽说只有十五载在安徽,可这是我生命中最精华的年月。枪林弹雨,风雪雨霜,坑坑坎坎,我是在这里成长以至有点成熟的。想起培育过我的安徽人民,崇敬和怀念之情,使我泪下。安徽有我最尊敬的两位老同志:张恺帆、陆学斌。他们已先后作了古人,他们可敬可爱的老伴史迈、吴铭也走了。悲痛之作——《座右之铭》,就是哀悼恺公的。

也曾抄了几份恺公三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五十年中所写的三首诗,为我和友人的座右之铭。好友吴铭走在陆老之前,我曾在她火化之日在电脑上作文悼之,写了三行,忽然随风飘去。我想她与我同在,她将以哀思随着泪水重现在我的荧屏之上,坐候夜半,未蒙

一见。最近听安徽来说,学斌同志的死,是一个悲惨的结局,生前身后都是寂寞的。我心很痛。一九六二年分别以后从未见过,去年见他在写给晓鹰的信中提到了我,这是近年来使我最震动的一件事。我的笔难以表达他的原意,敬录如下:

我对菡子同志很内疚,菡子原与张恺帆、陆学斌的所谓“反三面红旗案”没有什么牵涉。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我在大会上、省委会上都大声疾呼地反“大跃进”。半个多月的轰斗,我不牵连别人。但有一天斗争大会上,当权头头大声喧叱,说有个人,搞文艺的,叫她揭发陆学斌的罪行,她竟公然抗拒,说她的一枝干净的笔,是不写那肮脏的东西的。喧叱严厉,虽没点名,会场上许多人明白这是指菡子,空气万分紧张。我知道菡子是被无辜牵连了,当时我已被管制,没有办法去安慰她两句。以后我受一切惩处,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去劳改,菡子也倒霉下放。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我的案子全部平反,她的问题自然了然无事。很多人尊敬她能坚持真理,刚正不阿,干净的笔,不愿写违心的话去陷害人。

这是一九九五年一月五日写的,意犹未尽,后来又补充写道:

我很同情她的身世,想有机会见面安慰她,写信是不容易写出得体的话。我年已八十二,病得行动都困难,但我很怀念这位正直的女作家,在庐山会议那样严重的历史背景下,我已定为“张恺帆死党”、“反三面红旗”的大罪人时,被人胁迫写什么材料批斗我,她竟敢正面顶风抗拒,我一面敬重她一面也负有内疚的。

在这以后,不问我经过多少苦难,组织上的平反结论连同他的